



AI賦能的技術得到深度應用，達到提高生產率的目標，也造成就業破壞。

經濟觀察家

當前就業的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為「有人沒活幹」和「有活沒人幹」這兩種現象並存。研究人工智能（AI）和數字經濟對就業的影響，特別是造成這種結構性失業的原因，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這次不一樣」是經濟學家最愛用的一句話，不管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都習慣於把這句話作為開頭和立論，對事物當前和歷史上的相似度進行比較。

AI時代如何解決就業矛盾？

就技術對就業的衝擊而言，從歷史來看，有兩種觀點：一是，技術會破壞就業，導致人們失去工作而且無法回到勞動力市場；二是，經濟史證明，人們最後都能找到工作，崗位和職業也比過去多得多，因此，技術會破壞就業，但是終究還會創造就業。這兩種觀點一直都存在。

技術顛覆頻率加快

這次確實不一樣，體現在人工智能的速度、廣度、深度與以往任何科技都不同。人類有史以來，在1.2萬年前發明農業，這是一次最大的革命；在幾百年前完成工業革命，這也是了不起的革命；還有幾十次具有關鍵通用型特徵的技術變革，帶來生產方式的進步及產業的革命。但以上這些革命都不能與人工智能相比，因為人工智能的每一次進步都可以視為一次關鍵性的通用技術進步，都可以賦能到其他科技領域和產業領域。

當今人工智能的發展呈現出三個特徵：

第一，顛覆性技術出現的頻率越來越快，技術路徑也趨於多樣化。科學技術的發展，歸根到底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比如傳統的育種方式，以前是一年種一季兩季，如果沒有結果，第二年繼續試。現在由於數字技術的應用，可以通過基因編輯進行育種，這個過程的推進速度越來越快。有人說人工智能最核心的競爭力是便宜，把什麼事情都變得非常廉價，其實更重要的是速度，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完成無數次試錯。

第二，技術的影響範圍越來越廣，涉及科技、教育、政府、個人。在早期的技術革命中，機器人替代操作型的工人，承擔髒活、累活和危險工作。但現在的人工智能更傾向於替代高智能崗位，替代就業幾乎無遠弗屆。

第三，AI賦能的技術得到深度應用，達到提高生產率的目標，也造成就業破壞。發展人工智能投入了大量資源，特別是國外的大語言模型的研發投入巨大，包括數據、算力、能源等等。花了這麼多錢，最終是想賺回來，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推動深度應用，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生產率最傳統的辦法就是減少勞動投入，這自然對就業造成巨大衝擊。

新技術應用導致的最典型現象，就是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化。比如美國製造業的崗位實現自動化，人力資本高的人進入更高端的服務行業，沒有對應人力資本的人退回到低端崗位。他們或許都能生存，但是收入差距拉大，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化態勢形成。

這些年中國機器人安裝數量的增長速度是世界上最快，更不用說一般性的機器替代人。自從出現勞動力短缺以來，企業把更多的投資用來購買機器，以替代人工。這既會創造崗位，也會破壞崗位，究竟兩者之間是什麼關係？我們不能給出準確的答案，但可以通過一些數據進行觀察。

根據官方的數據，過去很多年的城鎮新增就業都是1300萬左右，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早已經歷負增長，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的新增就業？這是因



為我們只記錄了新增的崗位，不記錄損失的崗位。那麼，現在到底是創造的多還是損失的多呢？用「淨增就業」減去「新增就業」，就得到「淨就業創造或破壞」（數值為負就意味着崗位淨破壞）。從這個指標來看，2012年之前還有一些淨創造，2012年之後的淨破壞數額逐步加大，而且呈現持續累積的趨勢。（見配圖）

我們長期以來都在說人力資本很重要，特別是教育很重要，現在看來僅僅這樣說還是不夠的，AI時代人力資本有了並且仍將有新的變化、新的特徵。

首先，人力資本競爭從個人之間演變為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之間。過去我們對孩子投資，這是人和人的競爭。但現在新的人工智能技術對崗位的替代幾乎是無差別的，最近的趨勢反倒是替代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崗位。因此，人力資本競爭已經從人與人之間競賽，變成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之間對決，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背後有深刻的含義。

其次，人力資本培養必須是終身的，衡量標準也不再僅僅是「受教育年限」。隨着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人類知識和崗位技能變化得更快。「上學」和「升學」都不再代表人力資本培養，人們必須不斷學習，通過幹中學、在職培訓和再學習等全生命周期積累和更新技能。

再次，人類特有的能力通常是在早期兒童發展和學前教育階段形成，所以教育要向前延伸。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力是同質的，可以通過學習來提高競爭力。但人類與人工智能的競爭力是不同質的，我們必須找到自己最有競爭力的人力資本相對優勢。在體力勞動、操作性技能、認知能力等方面，新的人工智能已經超過人類。在非認知能力方面，譬如說人際交流、領導力、團隊精神、同情心、同理心等，以及隱性知識、實踐智慧方面，人類迄今仍具優勢。

有人提出一個所謂的「莫拉維克悖論」，認為人類所獨有的高階智慧能力，例如推理，只需要非常少的算力，但是要讓人工智能或機器人掌握無意識和依靠直覺的技能卻需要極大的算力。舉個例子，人工智能通過深度學習可以戰勝國際象棋和圍棋世界冠軍，但要讓機器人端着一杯水從這裏過障礙走到那裏，卻相當困難。

人力資本培養要「三管齊下」。其一，按照發展階段，教育的公共品性質愈顯突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要水漲船高。終身學習、教育向更早階段延伸，乃至延長義務教育年限，都需要大規模增加投入。迄今為止，中國公共教育投資佔GDP的比重是4%，大約是世界的中位水平，多年保持這

個水平屬於難得的成就。但一方面如今面臨的人力資本挑戰十分嚴峻，另一方面中國即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因此增加教育投入確有必要。

其二，明顯改善教育資源配置的均衡性和公平性，這可以在既定投入基礎上明顯提高教育質量和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

其三，啟動教育發展的第三級火箭，促進報酬遞增。教育推動經濟增長曾經有過兩級火箭：先是90年代開始的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當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發生遞減現象時，第二級火箭即高校擴招又啟動了，接續了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現在要啟動第三級火箭，包括義務教育分別向前後延伸等舉措。

應對思路需要轉變

宏觀政策上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過去在宏觀經濟遭遇衝擊的時候，我們通常出台一些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此來刺激經濟增長，使其回歸潛在增長能力，這就意味着回歸充分就業，消除周期性失業。

現在的問題是，在消除了勞動力市場周期性衝擊以後，自然失業率也跟着提高了。早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估算的自然失業率大概是5.1%，相當於充分就業的失業率，是可以接受的水平。疫情衝擊導致實際失業率高於自然失業率，說明三年裏大多數時間處在周期性衝擊之中，現在雖然逐漸回歸自然水平，卻保持在偏高的水平上。

還有一點需要關注，在過去十餘年裏，勞動年齡人口、城鎮勞動力、城鎮就業等不同口徑的勞動力資源，都已經進入或即將進入負增長階段，意味着總量性就業矛盾轉變為結構性就業矛盾，是一個發展階段現象，在趨勢上不可逆轉。

解決結構性問題，有很多可能性及應對的變化，除了人力資本的應對之策之外，還有一個舉措是顯著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這裏提到的社會保障和以往的含義也有所不同。過去強調不能養懶漢，要嚴格識別哪些人具備享受待遇的資格。未來勞動生產率得到極大提高，在人工智能的衝擊下，可能很難再識別誰是懶漢。這個時候社會保障體制將越來越具有普惠性與兜底性的統一，普惠的特點越來越明顯。

不能被忽視的是，未來勞動力市場制度仍然非常重要，要順應人工智能挑戰，與時俱進地構建新型勞動力市場制度，形成一套應對新矛盾的制度安排。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促進法為民營經濟提供發展保障



共創共享 戈峻

上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並於5月20日實施。這是中國第一部專門關於民營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法律，標誌民營經濟從政策支撐轉向法治保障的新階段，也寓意民營經濟作為平等市場主體地位，終於以法律形式確立下來，等於給予5000萬民營企業最強大信心。

對於一眾民營企業家而言，「民營經濟促進法」的重要意義在於給他們「正名」。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民營企業始終在所有制標籤的夾縫中生長，早期紅帽子企業的產權糾葛，市場經濟初期的投機倒把「污名化」，再到互聯網時代的平台壟斷爭議，民營經濟的貢獻與質疑始終並存。

今次的立法以平等準入、產權保護為核心，並將「競爭中性原則」寫入總則，同時確立「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平等獲取生產要素」，讓業內關注在招標投標、政府採購等公共資源交易中限制或排斥民營經濟組織的做法也將得到破解，終結了「玻璃門」、「旋轉門」的隱性歧視。此舉的深遠意義在於，民營企業能以「法定權利主體」的新身份，在更廣闊舞台上參與市場競爭。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另一個里程碑，是從過去的政策鬆綁到現在的制度護航。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與民營經濟相關的政策方向傾向是「打補丁」、「給優惠」。雖然政策出台善意，但往往因執行誤差而抵銷成效，今次促進法頒布突破過往思維，透過構建法律邏輯架構，從給優惠轉為給權力，將支持保護民營經濟的模式升級為法治。

進一步來說，立法促進民營經濟，強化對民營的法治保障，也回應了企業家對產權安全與經營自由的深切期盼。促進法強調國家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應當嚴格遵循法定許可權和程式，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需依法進行；超範圍查封、扣押、凍結企業資產的行為要禁止；也強調要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不能利用行政或者刑事手段違法干預經濟糾紛，將辦案件與辦企業劃出了法治界限，讓執法行為標準化、透明化，有制度可依。

促進法還專門有一章提及科技創新，從法律層面作出明確規定，支持民營經濟組織參與國家科技攻關項目，支援有能力民營經濟組織牽頭承擔國家重

大技術攻關任務，是首次在法律中明確支援民營企業牽頭進行重大技術攻關。

同時，促進法支援民營經濟組織依法參與數位化、智能化共性技術研發和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依法合理使用數據，對開放的公共數據資源依法進行開發利用。

一方面，這是對過去四十多年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的肯定，更是對這些企業的期待和鼓勵，不單支援民營企業日後能夠更好地專注科學技術投入，還鼓勵他們參與甚至牽頭重大工程的創新、重大領域的建設，從而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可以說，中國今天明天後天的科技脊梁，將會由民營企業萬眾之力一起扛、一起挺。

另一方面，讓民營企業在獲取數據要素方面得到跟其他所有制一樣的公平對待，將有助於解決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核心痛點，也能夠激發民營企業在人工智能數位經濟發展當中的活力。

港企受益 發展機遇更廣

《民營經濟促進法》雖是內地法律，但對於香港企業而言，該法的實施意味更廣闊發展機遇。香港企業可受益該法確立的公平競爭環境，更順暢地進入內地市場，參與科技創新、數位經濟發展等領域合作。

此外，促進法鼓勵民營企業利用各種方法融資，香港作為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 and 全球商業樞紐，其國際化環境及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可吸引更多優質內地民營企業來港上市融資，不單可提升融資效率，成為民營經濟的融資中心，更可通過香港「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利用香港平台對接國際資本。只要好好利用香港國際優勢和各種資源要素，民營企業加速壯大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我們常說，民營企業「56789」，即是民營為國家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就業，還有90%以上的企業數量。《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台，是對民營歷史貢獻的法治回應。我們也要清楚，法律的頒布不是終點，而是民營與國家共赴高質量發展的新起點，促進法不僅是解決現有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而且把目光放在更長遠的國家未來。誠如國家選擇在「520」這樣一個浪漫而莊嚴的日子實施新法，民營在國家的「深情告白」之下，也當奮發自強。

（作者為天九企服董事長兼CEO）

競爭加劇 港代理創新服務突圍



樓市強心針 廖偉強

近年來，「內捲」已成為內地企業與打工族的日常語彙，用來形容內部競爭日趨激烈，市場環境越來越艱難。眼下各行各業為求生存，在價格、質素、服務、環境及創新等方面展開激烈競爭，精細化經營成為常態，強調「性價比」，各類「平靚正」的產品與服務湧現。相較之下，香港的傳統經營模式顯得落後，地產代理行業亦因市場需求轉變及消費力北移而備受壓力。

港人鍾情北上消費，即使每次來回花費逾三小時，仍願以時間換取更優質的生活體驗。內地憑藉龐大人口基數、價廉物美及競爭文化，吸引大量港人跨境消費。過去數十年間，香港商家受惠於內地人口與資金紅利，無論產品或服務水平如何，均能客似雲來，毋須過度競爭。但新冠疫情後，內地「平靚正」的消費模式迅速崛起，香港商家未能適應這場競爭變革，地產代理行業亦開始感受市場壓力。

類似的現象亦出現在新加坡。當地經濟表面繁榮，但行業競爭愈發激烈，鄰近的馬來西亞憑藉低成本，提供高性價比的餐飲及娛樂服務，吸引新加坡人跨境消費。曾受惠於經濟紅利的新加坡商家，如今面對成本更低的競爭對手，必須迅速適應市場新形勢，以抗衡跨區域競爭壓力。這一現象顯示，傳統經營模式在低成本競爭面前逐漸失去優勢。

香港地產代理業雖然未有直面內地同行的競爭，但樓市調整、資金流入縮水、客源結構變化，以及社交媒體普及，已經令市場環境大幅改變。內地買家比例日益增加，他們對地產代理的服務要求更高，資訊透明度提升亦要求代理必須提供更具競爭力的專業服務。過去，部分地產代理因樓價升值而輕鬆獲利，部分人形成「躺平」心態，鬥心與

動力都開始轉弱，未能與時並進，逐漸失去市場競爭力。

打破過去「躺平」心態

在內地競爭文化影響下，商家更注重客戶需求，而香港地產代理若突圍而出，必須深入了解內地客戶的偏好。例如，他們在物業投資或生活配套上的需求，並善用科技提升服務效率。與過去依賴市場熱度不同，現今客戶更重視資訊透明度與個性化服務，代理若固守舊有模式，難以在競爭中突圍而出。業界必須快速適應環境變化，提升專業能力，才能在新市場形勢中保持競爭優勢。

市場環境急速轉變，地產代理行業亦不能滯不前。面對新挑戰，代理必須打破「躺平」心態，積極回應市場需求，透過專業化、精細化及科技化提升服務質素，才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站穩陣腳。隨着內地競爭文化的滲透，以及港人消費模式轉變，香港地產代理不僅要與本地同行競爭，更需適應跨境市場的需求變化，在新生態下找到立足之道。

（作者為利嘉閣地產總裁）



面對新挑戰，代理必須打破「躺平」心態，才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站穩陣腳。